

品味

中医

皋永利 著

尊苑出版社



- 中医临床发展靠什么来说明？
- 中医「证疗效」与西医「病疗效」有何关系？
- 现代背景下中西医的关系如何建立？
- 「中西医并重」的本质意义是什么？
- 中医特色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 阻碍中医走向世界的门槛儿在哪里？

品 味 中 医

皋永利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味中医/皋永利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077 - 4244 - 2

I. ①品… II. ①皋… III. ①中医学 - 研究 IV. ①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1823 号

责任编辑：周乙龙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三河市德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890 × 1240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2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23.00 元

自序

《把脉中医》出版之后，本想静下来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对过去的一些认识细细回味一番。然而，十几年来对中医发展的关注和思考，已经成为了习惯，遇到问题便难以释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继续跟随中医发展的脚步，对近年仍在争论和新出现的问题，在思考的同时又陆续撰写了 60 余篇文章，有 40 余篇在《健康报》“中医周刊”版和《中国中医药报》“视点”版刊出。意料之中是，其中一些观点同样在中医界引起关注和反响。为满足更多读者的需要，稍事谋划与整理，《品味中医》便瓜熟蒂落与大家见面了。

虽然时间只有两三年，中医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是很多。也许这就是中医的与众不同，永远是那么引人注目，让人关切，令人深思。

导致中医问题不断涌现的原因，仍然在于中医突出的文化性与自然科学本质的隐匿性。站在不同的角度，便有不同的认识。传统与现代的比较，发展与回归的碰撞，成为引发学界讨论持久不衰的直接原因。

客观地说，经过长期讨论之后，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例如在中医方法论层面的共识远没有形成，认识上的困惑与分歧依然严重；中医自主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而实践原则并不清楚，“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常相对立，依然认识模糊，争论不断；中医文化

建设的根本意义何在,中医的根脉靠什么来延续,“中医热”形成的基本条件又是什么,对文化认识的关键点仍然没有准确的把握;中西医结合的真正医学价值在哪里,二者是否存在通约的根据,“中西医并重”的深层含义又是什么,对中西医关系的深刻性认识尚不充足;临床名医为什么少了,临床科研为什么开花多结果少,中医发展创新的立足点在哪里,什么才是真正的临床创新,用科学家标准评价名医是否对路,依靠什么来赢得中医市场,认识远没有到位;还有中医魅力形成的要素是什么,什么是影响中医走出国门的门槛等问题,同样需要继续深入的探索。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用功思考,算不上深入,作为一家之言,愿能对中医发展道路的探索有一点启发。

或许再过十年,有些问题仍然不会有答案,认识依旧得不到统一。但是,只要我们肯为之付出努力,将研究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推动中医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作为中医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与意志。

本书与《把脉中医》可视为姊妹篇,只是本书的内容在撰写上更耐心、更理性了,名曰“品味”,用意即在于此。至于本书的价值如何,仍然交由读者来评判吧。

最后,我要由衷地感谢《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多年来对自己的一贯支持,感谢学苑出版社的厚爱,没有你们的鼎力帮助,就不会有《品味中医》。

皋永利

2012年7月于济南

目 录

| | |
|--------------------|----|
| 一 中医方法论之困惑 | 1 |
| “李约瑟难题”与中医发展之难 | 2 |
| “理论万能”是中医理论发展缓慢的根源 | 10 |
| “重道轻器”不是现代中医之路 | 14 |
| 中医“现象论”不能绝对化 | 18 |
| 要客观评价“五行学说” | 21 |
| 两说并存，利于发展 | 26 |
| | |
| 二 自主发展的应有之义 | 29 |
| 中医“自主发展”的三个原则 | 30 |
| 中医临床要坚持中医的主体地位 | 34 |
| 理性面对中医药发展的矛盾 | 38 |
| 既要“中医研究”又要“研究中医” | 42 |
| 拉斯克奖属于“研究中医”者 | 45 |
| “中医研究”也要遵循科学精神 | 47 |
| 中医现代研究需要弄清的三个基本问题 | 50 |
| “传统医学”也要发展 | 55 |
| 两个“倒逼”道出中医发展关键 | 57 |

| | |
|----------------------|-----|
| 三 中医发展只能用疗效说话 | 62 |
| 临床名医为什么少了 | 63 |
| 临床成果,果应当结在实践中 | 65 |
| 临床成果推广遇到的“坎” | 66 |
| 中医发展要用疗效说话 | 69 |
| 别用科学家标准评价名医 | 71 |
| 论文不是考核中医人才的金标准 | 74 |
| 赢得中医市场靠什么 | 76 |
| 四 中医文化就是中医的足迹 | 80 |
| 对中医文化的理解 | 81 |
| 靠什么延续中医的根脉 | 84 |
| 中医文化首先化育医者之心 | 88 |
| 中医文化“热”重在疗效传导 | 90 |
| 中医文化建设应关注三个问题 | 93 |
| 中医文化建设中的两对关系 | 97 |
| 为中医创新营造文化氛围 | 100 |
| 五 中医与西医当牵手同行 | 106 |
| 中西医通约的内在依据 | 107 |
| “衷中参西”不是“中医西化” | 110 |
| 中医与西医有竞争更须联手 | 115 |
| 中西医结合“三原则”体现的是科学精神 | 118 |
| 重新认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价值 | 121 |
| “中西医并重”的另一含义 | 123 |

| | |
|---------------------------|-----|
| 六 特色的根本就是一种优势 | 126 |
| 中医优势需要多视角评价 | 127 |
| 正确认识中医特色下的短板 | 132 |
| “治未病”要树立大市场观 | 136 |
| 评价中医不能以偏赅全 | 139 |
| “辨证分型”不容否定 | 142 |
| 从冷落单方评“方法决定论” | 145 |
| 现代化不要丢掉“廉便验” | 148 |
| “廉便验”与“创收自给”难两全 | 150 |
| 七 “证疗效”与“病疗效”远不是一回事 | 153 |
| 评价中医疗效不能止于“以证为标准” | 154 |
| 中医疗效评价应避免两种倾向 | 156 |
| 从更高水平看中医疗效 | 160 |
| 八 创新要听命于时代诉求 | 166 |
| 中医发展创新的两个立足点 | 167 |
| 继承与创新中医药是时代需要 | 170 |
| 中医情志学研究的现代启示 | 173 |
| 话语转型：用现代语言表述中医 | 177 |
| 临床贡献率是中医科研评价的核心 | 181 |
| 什么才是临床创新 | 183 |
| 中医药研究需要关注三个方面 | 186 |

| | |
|---------------------------|-----|
| 九 中医的魅力源于内功 | 190 |
| 四大因素成就中医魅力 | 191 |
| 中医大师的魅力何在 | 194 |
| 解读铁杆中医 | 197 |
| | |
| 十 中医走向世界的门槛 | 201 |
| “国际认可”是中医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 202 |
| “国际合作”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 204 |
| | |
| 十一 科普的目的是授人以渔 | 208 |
| 中医养生科普 理念先于方法 | 208 |
| 微博让中医回归百姓 | 210 |

一 中医方法论之困惑

“本来富有辩证意义的阴阳范畴，一旦固定为自然科学本身的解释模式，就会对科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为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解释上。”

由于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消极探索思想，只有宇宙观而没有本体论，重社会伦理而轻科学求知，基本满足于“常识性”的自然知识而不深究所获得的知识何以是正确的，最终导致中国传统中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的缺乏。

理论上的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研究手段和方法上的对立。同样，不能因为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本体的，而中医学就只能限于宏观而不能向本体涉足。

如何将宇宙观向本体论转移，将研究重心从形上向形下转移，进而解决结构与细节不清的问题，是打开中医发展之锁的钥匙。

在一定层面上对医药解说的“无所不能”，是中医理论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如果将中医的关系论仅限于现象层面，就现象论关系，其意义与就现象论现象相去不远。

道由器生，重道而不重器，重道便是一句空话。唯有器道并重，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医快速发展。

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的快速发展使哲学无力驾驭。科学之马挣脱哲学之缰，是科学规律使然。

“李约瑟难题”与中医发展之难

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一情况与中医的发展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历史上的中医是辉煌的，为什么近代以后便辉煌不再，而且逐渐萎缩？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便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答案，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他的研究有助于找出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又是不谋而合：中医近百年来的争论，不也是在为中医寻求一条可行的现代化之路吗？此种巧合绝非偶然。科学与中医在中国走的应当是一条相似的发展路径，他们受到的影响和施加的因素也应当是一样的。许多学者在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答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探索中医发展之路也应当具有同样的参考价值。

在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多数学者把问题都集中在了中国的文化上，认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是导致科学在中国近代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在《也谈李约瑟难题》一文中说：“当前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很多，我的观点是：或许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到这点，才有助于建立我们新时代的创新文化。”他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流自然观认

为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在方法论方面，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不追求以严密和精确的方式来认识自然，而更多的是凭借直觉。道家思想主张的“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等顺应自然的观念，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历史上的基本取向则是追求“天意”、“无为”和“出世”。北京大学哲学系章启群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无能为力的消极含义”。这种消极态度的严重后果就是严重阻碍了人们探索自然的热情与积极性。著名学者、思想家顾准先生说过：“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美国汉学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先生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杨振宁博士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在没有演绎逻辑学的情况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所以，一些数学家认为：中国没有数学，只有算学。即中国的数学缺少严密的推理与论证。缺乏以严密逻辑推理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哲学精神，是无法催生出现代科学的。所以，尽管中国有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诸多发明，却最终没有诞生像样的科学理论。直到 16、17 世纪前，中国的技术发明走在世界前列，而在科学思想和精神上，在演绎逻辑学的方法论上，则远远落后于希腊。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发表的《张东荪解释“李约瑟难题”》一文，其中一些观点也颇有意思。文章指出，张东荪（20 世纪中国很有建树的哲学家）认为中西所以不同之故，其种子就在于古代，并不是由近代而突然变成的。西方有科学不

是偶然的，科学之成立虽只在近代，但其精神却在近世以前。科学未发生以前，科学的种子却早已存在了。特别提出，西方科学的出现是因为“‘物’（Thinghood）之概念之创造。”他解释道：“在科学未真成立以前，人类对于物并没有清楚的概念。从这一点上来讲，科学与历史可以说根本不同。科学的对象是‘物’，而历史的对象是‘事’。中国人尤其古代，可以说对于物没有清楚的概念。关于这一层就是现在所要讨论的，不仅表明科学与历史的不同，并且要说明何以中国思想只偏重于历史而不发生有科学。”张东荪认为只有把“实证”、“自然之齐一性”、“实验法”和“因果”这几个概念连缀在一起才能产生科学，这些概念是互相关联的一组。他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从古就没有这一组的概念，所以来不会发展为科学。现代中国学者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中国思想中有一部分是合乎科学精神的。殊不知真正的科学对于上述的几个观念是不可缺一的。”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思想上尚未形成严格的‘物’之观念，其故乃是由于中国只有宇宙观而没有本体论。因为对于‘本质’没有清楚的观念，所以对于宇宙不求其本体，而只讲其内容的各部分互相关系之故。因此没有把物从时空中抽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始终对于物没有像西洋科学家那样的观念。”这也许是中医只讲整体、讲关系而不重视实体和结构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是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钟明奇先生撰写的《“李约瑟难题”的哲学探解——评金永植教授〈朱熹的自然哲学〉》（金永植是韩国汉城国立大学教授）。文章说：照常理来看，朱熹的自然哲学当然不是朱熹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金永植教授为什么要苦心孤诣地去解读朱熹的自然哲学

呢？因为这涉及到有关中国文化走向的一个大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我们当然已经走出了朱熹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真正走出了朱熹所代表的文化？研究朱熹的自然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研究朱熹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由于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其自然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宋以后我们民族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中某些至为重要的方面。科学革命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是与我们民族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金永植教授锲而不舍地研究朱熹的自然哲学，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朱熹有多少自然知识，而是朱熹用怎样的哲学眼光去解读自然世界。

文章说，金永植教授相当深刻地解剖了朱熹探究自然世界的最主要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朱熹从没有真正把自然世界的问题当作问题来思考，他的兴趣总是在社会与道德方面。他思考自然世界的一些现象主要是为他阐释社会与道德问题服务的，或者更确切地如金教授所说，“他往往是在论及道德与社会问题时才提及它们，用一些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来与复杂而困难的社会问题作类比。真正为自然现象而讨论自然现象的情况在朱熹那里绝无仅有”。概括地说，朱熹重社会伦理而轻科学求知，以道德修养为本位，而不以科学求知为本位。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朱熹不可能真正深入到自然世界的堂奥中去。对朱熹来说，用于作为探求自然世界的最好的哲学术语莫过于“格物”了。但朱熹所谓的“物”，首先是“事”。“格，至也。物，犹事也。”诚如金教授所说：“朱熹的‘格物’，主要是重在道德与社会问题上”。可以说，朱熹对知识的探求带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倾向，它往往将对真知的探求向伦理化方向发展，造成以善代替真的局面。

事实上，此种“格物”的求知思维方式隐藏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更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即与“格物”观紧密相联的，是自然界的秩序背后的道德上的秩序，“格物”在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方面最终要为道德提供一个“宇宙的基础”。这可以看出他们格物求知的真正目的。一旦这个“道德的宇宙基础”建立，他们就没有多少兴趣去关心提供这个基础的自然世界本身了。因此，朱熹式的格物求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思维方式，而且显示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思维特征，总体上与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

文章说，关于朱熹自然观的总体特征，金教授的概括至为精辟，即朱熹不严加区分自然世界与非自然世界；他喜欢从既成的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如阴阳五行等出发而不是从自然现象本身出发去解释自然世界，这就是把自然世界看成“概念的图式”；他不能把某些自然现象的特征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在求知上的“个别论”特性；他基本满足于“常识性”的自然知识，不深究所获得的知识何以是正确的这样西方认识论中的主要问题。所有这些，与朱熹格物思维方式的缺乏精确性、不喜欢对自然现象做深入探究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不难看出，由于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消极探索思想，只有宇宙观而没有本体论，重社会伦理而轻科学求知，基本满足于“常识性”的自然知识而不深究所获得的知识何以是正确的，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的缺乏，导致了科学的落后。反观中医近代以来的发展滞缓与突破之难，是否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我们在对中医蕴含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引以为骄傲的同时，是否也意识到中医作一种具体科学所受到的文化上的制

约？中国科学上的“李约瑟难题”已成为历史，由于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的发展与支撑，中国正在成为科学强国。而中医发展的难题何时得到真正破解呢？

中医属于自然科学，理性精神与演绎逻辑方法同样是中医破解人体生理病理奥秘、寻求人体深层规律的重要支持。中国文化对中医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医因此形成的缺陷也是突出的，那就是结构上的模糊和细节上的不清，这是中医发展滞缓的根本症结所在。有人说，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还难以满足中医发展需要，一些重大的问题有望通过系统论方法、复杂性科学方法来解决。我们知道，不论系统论方法还是复杂性科学方法，它们适用的研究对象，如果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其整体和关系，不是模糊的、笼统的、细节不清的，相反，系统的要素都是清晰可见的。只有在要素清晰的状态下，才能有条件来考察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去把握系统对象。这就是说，中医发展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宇宙观向本体论转移，如何将研究重心从形上向形下转移，进而解决结构与细节不清的问题，不解决这个核心问题，任何方法都难以打开中医发展之锁。

有学者一直坚持中西医“不可通约”的观点，就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来看，中西医之间确实存在着通约的障碍，但是发展地看，“不可通约”是有时代性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现代科学水平的提升，随着中西医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中西医一定会在一个适合的科学层面上达到统一。所以，我们不能僵化地看待中医的发展，更不能通过固守而不是创新来发展中医。目前中西医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上，在科学属性上它们是相同的，即同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因此，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应当是有共同之处的，也就是说，理论上的

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研究手段和方法上的对立。同样，我们不能因为西医学主要是对研究对象“本体”的探索，而我们中医学就只能限于宏观上的把握而不能再向本体研究涉足。不可通约论不应成为阻碍中医学研究重心向本体论转移的理由。与此相同，“科学多元化”的提出，也不会成为中医发展问道于现代科学的障碍。

中医概念模糊，是导致中医理论笼统、缺乏严谨的根本原因。在分析中医概念不清晰的原因时，有学者提出：“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这种观点不仅不能对中医“概念不清晰”问题进行有力反驳，反而为中医概念存在的缺陷提供了依据。这恰好印证了学者李侠先生在《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一文中的观点：“我们只有看到了作为竞争对手西医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的事实”。换言之，我们只有看到了西医的一些优势，才感受到了中医自身的一些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学东渐，没有西方科学在东方的推广普及，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现代科学的文明与发展，就有可能还停留在以阴阳五行解释科学现象的古代科学水平上。西学东渐，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现代科学对中医的发展也将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原因就在于近代以前没有与西方科学形成比较。近代以后经过了比较，我们才发现对自然科学现象完全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